

1910  
香樹市西區文史資料

第6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西區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



## 目 录

### 往事追风

- 往事追风录 ..... 1

朱曼隐

### 人物春秋

- 中国彩色地图创始人邹代钧事略 ..... 11

邹兴华

### 工商史话

- 余太华金银首饰店 ..... 17

朱延鸿

- 劳九芝堂药铺 ..... 20

张仲昆

### 西区古今

- 长沙濂溪中学的回忆 ..... 25

雷迪湘

- 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建和发展 ..... 30

冯崇义

解放前后西区水灾实况	34
苏宗洞	
从淄博市的码头谈起	38
傅贵翠	
神话中“点石成金”的金线巷	41
兰 烟	

## 往事追风录

朱 费 鳌

(本文作者朱费鳌先生，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年八十七岁，湘乡人，毕业于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学校第三分校及陆军大学将官班，曾任湖南醴安处上校参谋主任，兼湖南第一荣誉团团长，中央银训所少将处长，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级参谋兼湘乡县县长，解放前夕，参加起义。)

## 大革命前后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湘中、湘南等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我当时年方二十五岁。家住湘乡杏子铺（现为双丰县杏子区），少年时读过私塾，家庭中农成份。也许是因为我有一点文化知识，也许是出于农民阶级的阶级本能。我当时对这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朦胧的向往，我见到附近区乡，很多都成立了农民协会，“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不禁心驰神往，于是我便邀集了一些贫苦农民和我读私塾时的一些同学，自发地组织并成立了“湘乡杏子铺乡农民协会”，我们这一行动得到了区农民协会的

认可。当片区农协的负责人见我出身农民，又有点文化知识，就保送我去入“湘乡中里农村师范讲习所”学习，湘乡当时分为上里、中里、首里三大区划，上里即今涟源县，中里即今双丰县，首里即今雨乡县，这个“讲习所”是按照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精神而成立的，其目的是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推动农民运动。冠以“师范”二字，还具有普及农民的文化知识这一意义在内，我记得当时“讲习所”的所长刘饱满，体育老师肖海清，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教育下，我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不久由刘饱满、王俊恒、李笑山等人的介绍，加入了所内的 C Y 组织。

在“讲习所”学习了大约一年左右。这时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北伐战争也节节胜利，为了防止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北洋军阀败兵溃散的骚扰，湘乡上、中、首三里都成立了农民自卫队，中里为第二中队，我毕业以后，被任命为付队长，正队长叫王俊恒，当时自卫队主要是接收中里团防局杨道南的武器，有枪百余支。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爆发了血腥的“马日事变”。“马日事变”的元凶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正是湘乡人，他手下的一个营长叫罗鑫，也是湘乡人，罗鑫会同一些因逃避农民斗争而逃至长沙的湘乡土豪劣绅团防恶霸杨道南、肖介潘、贺兆仑等人在长沙

鱼塘街大乐居旅社举行会议，成立“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湘乡分会筹委会”。阴谋策划镇压湘乡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发出拥护许克祥反共的通电。不数日许克祥的部队就向湘潭、湘乡方面进攻了。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总工会派柳直荀等同志在湘潭总工会召集了有湘潭、湘乡及新化锡矿山等单位参加的军事会议。湘乡派黄以良、柳宗陶、胡叔尼等同志参加。会议决定湘潭的工农武装力量在易家湾一带抵抗，由湘乡派队支援，锡矿山的武装开派至湘潭，以抗击从邵阳方面来犯的反动军队。当时我们“湘乡中里农民自卫队”已改名为“湘乡工农义勇军第二中队”，共有四百多人，我和队长王俊恒奉命率领这支部队赶赴湘潭支援。阻击来犯之敌。大约在五月二十八日，我们抵达云湖桥与大部队汇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罗鑫所率领的反动部队向西进犯。我们的军事指挥部设在离云湖桥不远的一个山村里。他们见涟水河里敌人有几十条木船，乘着机关枪逆水而上，于是命令队伍沿河阻击。片刻，涟水北岸站满了工农义勇军，口号高举，鸟铳连响，红旗似海，敌船见岸边人多势众，扫射了一阵机关枪，便倒转船头逃窜了。正当大家沿岸追击的时候，忽然从浏阳路方面传来了急促的枪声，原来是浏阳路是从洼地进犯的敌军，趁我们聚众沿河之机，竟一举打掉了我们的指挥部，乘势疯狂地进行反扑。我们在数量上居绝对优势，但在武器装备上却处于绝对劣势，指挥部被打掉，一时群龙无首，结果被击溃于马托铺、端铺湾。

一带，伤亡惨重。我亲身参加的这次反蒋讨许，保卫湘乡农民革命运动的武装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五月三十一日晚，许克祥部罗森营进据湘乡县城，白色恐怖笼罩全县，他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我起初躲藏在族人朱贻德和朱六十家，后来风声日紧，搜捕日烈。我自知躲藏不住，不得已装扮成船夫逃到湘潭，又混入北汉口的李亚芬团长在湖南所招的新兵火车上逃到武汉，随后进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所办的济难会，暂时安下身来。济难会收容了从各省各县逃来的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湘乡的王仁恒、李实夫、曹海清等入也在其内。我们会合在一起，仍继续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大约是一九二七年秋季的某一天，我们参加了在武昌红杨碧花公园的集会，听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演讲，可惜年久月深，毛泽东同志演讲的详细内容我已无法记忆，但总的精神是痛斥反动派的流言蜚语，勉励我们继续奋斗。不久武汉的形势又发生逆转，唐生智孙夏斗寅在前线倒戈，宁汉合作，汪蒋合流，济难会也被解散，武汉又笼罩在惨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湖北省委李汉俊、石大悲都被杀害了。我当时藏身无地，惶惶无主，幸好程潜将军统率的第六军驻在武昌，招收学生总队，原济难会同入，大部分都考取了，我改名朱玉泽，也考取了，编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杨恩伯，见我考取的成绩不坏，有点文化知识，操练时姿态端正，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对我印象颇好，接近机会颇多。

这时各省、市、县的反动统治者纷纷派人来武汉搜捕漏网的共产党员和所谓“暴徒”。我得知我这一中队有李一眉等九人都被列为搜捕目标，心中恻然不忍，于是我乘间向汤进言。我说我们这一中队中原济难会人员很多，大都是从各地来投奔武汉革命政府的，如果让人点名索捕，势必动摇军心，使学生总队解体。汤恩伯当时是程潜将军的部下，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程潜将军一贯反蒋，所以汤对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并不积极，何况这一行动又涉及他个人的地位和势力，因此便接受了我的意见。并问我怎么办，我说放他们九个人离队算了。汤说如果他们来索阅花名册怎么办？我说我当过司书，会造花名册，把他们九个人的名字删掉，重新造过就行了。于是汤叫来中队司书，会同我重造名册，我便通知李一眉等九人从后卫门逃走。

以上是我在大革命时期几件值得回忆的往事，此后我便一直在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中服役，直到解放前夕，才参加起义。

### 起    义    前    后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九四六年我进入国民党政府的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一九四八年冬毕业。这时解放战争进行已有三年，国民党政府已成土崩瓦解之势。程潜将军因竞选副总统失败，与蒋介石的矛盾日深，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我

揆情度势，深知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灭亡可指日而待，所以我离开陆大时，拒绝了陆大同学方先觉军长要我出任师长的邀请，毅然回到湖南，投奔到程潜将军的麾下，被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级参谋。这时解放大军已逼近湖南，和平解放，避免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已成为三千万湖南人民共同的愿望。程潜将军应天顺人，早已内断于心，作了起义的准备，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一次当我谒见他，向他请示工作时，他只说了一句：“你跟着我走好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湖南省政府发表了我为湘乡县县长的任命。湘乡是一个大县，地处粤宝路要衝，是长沙的屏障，我临危受命，深感责任重大，但我已暗暗下了决心，要跟着程将军走，因为这时候一方面湖南的和平解放已渐露端倪，而另一方面“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部队已由湖北败退进入湖南，据守衡阳、邵阳一带，程潜将军在白崇禧的重兵威协之下，由长沙迁至邵阳，长沙由十九兵团司令陈树仁将军的部队驻防。在这种情况下，湘乡的战略地位显得尤其重要。但我湘乡县长的任命刚一发表，就遭到了湘乡反动势力的反对。湘乡军警稽查处长彭诗圭、三青团干事长李昭、退伍军人协会会长谢勋之等组织“拒朱委员会”，到处贴标语、发传单，说我民国十六年当过农民协会主席，当过农民自卫队副，并在“马日事变”以后打过许克祥。这个时候来担任湘乡县县长，肯

定是为共产党张目的。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程潜将军和陈明仁司令，这时陈明仁司令的部下新任七十一军军长彭锷有两个师驻在湘乡，于是陈明仁司令要我随同彭锷军长赴湘乡接事。而当时湘乡县参议会参议长吴崇钦也对我就任湘乡县县长表示支持，并以县参议会的名义来电欢迎。（吴崇钦系湘乡县比较开明进步人士，一九五一年镇反高潮中被错杀，现已平反，恢复了起义人员身份。）这样我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顺利地接任了湘乡县政。

接任伊始，我深感湘乡情况复杂，自己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稍一不慎，危及个人的身家性命，尚是小事，如果给程潜将军和平解放湖南的正义事业带来阻力或损失，那就将贻误大局罪无可逭了。于是我一方面积极联系湘乡党政军各界的一些开明正派人士，如参议会参议长吴崇钦、国大代表谢瑞琪（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原南北战争时期湘军第一军军长宋鵠庚（五一年镇反高潮中被错杀，现已平反。）湘乡县党委书记周意孟（解放后曾任湘乡县政协委员，已死）等，争取他们的支持，以孤立彭诗圭、李郁等顽固势力。另一方面我又对湘乡各机关部队的中下级干部，特别是警察部队、自卫队、保安部队中的人员作了一次周密的考查。我利用我曾在何健、刘建绪所办的第四路军于部教导总队、张治中所办的湖南干部学校、薛岳所办的湖南省干训团、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中曾经工作过的经历，查清这些人中哪些是我的学生、部下、

故旧、知交、亲戚、本家，把他们或调或升，安排到各个要害部门，作为我的心腹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样我就为湘乡铺下了一条通向和平解放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湖南的局面是战是和，日趨明朗，陈明仁将军在长沙召开千人大会，明确表态：湖南问题以三千万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八月初程潜将军由邵阳重返长沙，准备正式宣布起义。邵阳、长沙两地，相距三百多里，程潜将军原先南退至邵阳，表面上接受了白崇禧的劝告，实际上是迷惑敌人的一种手段，所以他这次由邵返长是非常秘密的。这对湖南的和平解放具有重大的作用。我得知这一情况，马上从上起界岭，下至云湖桥，布置了近两百里长的哨卫，尽全力加以保护。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下午，我邀请驻县城的七十一军彭锷军长和两个师长、参谋长及全县公法团首长，在湘乡县城务门前街同林酒馆后花厅举行盛大宴会。席上彭锷军长首先发言，公开宣布拥护程潜将军和陈明仁将军和平解放湖南的正义行动。我接着发言拥护彭锷军长的意见，并宣布湘乡只有起义，才能解民倒悬，才能符合湘乡百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会后我拿出早已拟好的起义电文，要求各界人士签名，领衔的是七十一军军长彭锷，湘乡县县长朱费隐，八月四日清晨通电就发出去了，湘乡正式宣告起义。

起义通电发出后不到两日，不料风云突变，兼长沙警备司令刘

进同，七十二军前任军长熊新民突然由湘潭赶来湘乡，策动七十一军的师、团长反对起义，首先把积极参加起义的刘勋浩师长扣押，随即挟持新任军长彭得于八月六日晚上向邵阳逃窜。临走时派了几营兵力包围湘乡县政府，声称有事商量呼我出府，企图杀害，幸亏我的警卫大队长朱应安临机应变，佯称“朱县长早就不在县府睡觉了，他睡在草萝巷吾园，你们到那里去喊就是”。说完即入室内叫醒我。我马上从县府后面逃出，躲到废防空洞内，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清早，我赶忙将这一情况电告程潜将军，两天之后解放军一三八师和一四五师进驻湘乡，于是秩序恢复正常，大局始定。

八月中下旬白崇禧所部一个军，由军长成刚率领与窜逃的七十一军会合，从邵阳方面倾巢两出，疯狂进行反扑，其前锋已逼近朱津渡，一时黑云压城，湘乡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他们暗地组织维持会，造谣惑众，涣散人心，企图占领县府并杀掉我，以配合反动军队与人民解放军顽抗。这时湘乡县有一部份警察部队和自卫部队在他们的挑动和唆使之下，又受七十一军叛逃的影响，居然违反解放军一四五师沈启贤师长和我所下达的“只许北退，不许南渡”的命令，深夜从县城望春门南渡涟水，并将我劫持，一同行动，声言如果抗拒，就枪杀于河边，我被劫持到东台山下，不得自主，惶恐莫名，幸好这些人是一群乌合之众，秩序混乱，纷纷惊嚷，乱成一团，我乘其不备，假装入厕，沿河狂奔，从上游偷渡入城，跑到解

解放军的一个团部才得脱险。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我召集在城的警卫队，亲自率领上街巡查，安抚民心，维持秩序，稳定大局。我此举受到了解放军驻军首长的嘉许和湘乡人民的称颂。

不久，解放军发动了衡宝战役，一举将白崇禧的部队击溃，湖南全境肃清，九月南下干部宋子兴同志来县接任湘乡县长，湘乡正式建立了人民政权。当时程潜将军已被任命为湖南省军政委员长主任，我回到长沙，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参议，后改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 中国彩色地图创始人邹代钧事略

邹 兴 华

我的大祖父邹代钧，字伯闻，又名君甫。湖南省新化（现属隆回）县乡洪人。是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我国铜版彩印地图创始者。他曾任教清廷京师大学堂，两湖书院和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地理，当时，世称绝学。黄兴、蔡锷、李元洪，均系其门生。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廿一日，未生时，其叔祖父汉章，督师广西，春日假寐，梦古代名人毕秋帆沉入罗洪里第，后得本书，适他生日，故又取名元帆。他从小好学，家中常缺灯油，他点油灯火来来回舞动，借光看书。因他博览群书，光绪五年湖南督学便考取他然考古，以槐叶冷淘赋命题，全场无知之者，得其卷大奇之，补其学博士弟子员。有一次，他又到汉口亲友家，亲友告诉他：‘汉口街道复杂，出外须小心迷路’。他笑道：“怎么会迷路呢？汉口我只要走一遍，就可以绘成图。”亲友笑他吹牛，约好共同商与绕汉口一周。结果，他不但绘成了图，而且还将主要机关、酒店招牌，都记载详明，亲友大惊，称赞他的眼睛真象一部照像机。他返回家乡，路过原住高坪客栈，见老间痛哭不已，问其由，曰：“家中失火，房屋烧了两间，小，帐房帐簿被焚，账目不回来，求生难以生活。”他安慰老间说：“我先前住你店时，闲坐无事，看了你的

帐簿，我可以替你重抄。”老间惊喜，留住半月，帐簿果然被他重抄好。后来人们故赠他一付对联称颂他：“过目不忘抄帐簿，扬鞭走马记招牌。”

左宗棠督大军西伐时，他背着自己祖父邹汉勋（湖南近代知名学者）说著，迳往甘肃酒泉军中，求左校正。宗棠欣然代为书序和出次，并委以参谋军事。

光绪十一年（1885）秋，帝命大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时曾忠襄督两江，夙器重他，推荐给刘说：“通家子邹沅帆者，国士也，备位参随，必有裨益。”瑞芬欣然相召，他因得以周游英、俄、法、意、比等十余国，纵观欧亚全势，遂计划东三省、蒙古、新疆铁路拟修之线，由中亚细亚西北利亚南下，包举我国北东西三边铁路，以抵制俄国。他在国外，留心考察，撰写《西征纪程》4卷，对沿途各国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风俗、物产、时事等均有详细记载。并从国外带回一大批科技图书资料和制图仪器，自设“法仪室。”在武昌创办“中国舆地学会”，开始出版中外地图，但所译绘西方地图原本，比例有用英、法、俄尺者，杂乱无章，未据他所创中国舆地尺，以归一律。先是他在伦敦研究地学时，闭户曾推度里之差，嫌倍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有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以地定尺，是为迈特，法国之尺度名，一边特为四千万分地周子午圆之一，以我国华尺与迈特比，为一万二

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千万分之比，故华之一尺，适等于百万分迈特之三十万零八千六百四十二。他以此率，命工丁制成中国舆地尺，国外之精通测算者，悉服其精密；亦当时中国五千年以来，未有之创举。

他回国时，适清廷开馆续修会典。他即上书五千言，阐明测绘地图之事，其要旨分三大端：1. 测天度；2. 测地而；3. 成率成图。说理精湛，用之测绘而皆准。英人傅兰雅读之心折。那时绘图，甚多通晓，惟测天度，以其原本经术、略治欧法，实反前人未发之蕴。当时，国内所印地图，一般没有颜色，少有彩色地图，都是用手工填的，我几个姑母都参加这种填色，劳动强度大，发行数量有限，精确度也不高。后他从日本学回印彩色地图的方法，首创中国铜版彩印地图。

他又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积极活动者，清相国张文襄督两湖时，具百金为他序，电调至鄂，主修湖北全省地图以资典故，委得圣旨允。图成，辅之以说明。文襄赞其见识伟略。

他对我国东南海岸，西北边境，考究尤详。光绪十九年（1893），中日战争爆发，他陈述清廷当道，建议“分全国为五镇，征兵各道，集中京津，用新法训练，移防遵阳、牛庄、海盖金，要与日人为持久战。”并提议：“合南北洋闽广水师船哨海，以断日军运船接济。”书累数万言，很当道和战意见不齐，卒被不录。

订与关条约，割去台湾澎湖，饮恨不已！遂绝仕进图维新。

光绪二十年（1894），张文襄聚全国英才开译书局，留他总海国地理编辑事。次年夏，湖北巡抚谭继洵委允督办处。而陈宝箴由鄂派擢湖南巡元，以代钩湘悉三湘利害，请之归，咨询方略。他建议说：“湘所长者资源，但入贫而地不贫，五金百宝比比皆是，欲求富强，唯有开矿。”于是常宁水口山，平江黄金洞，两矿并举，真立法教详且备。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他与江标、谭嗣同、梁启超等在小东街刘权芝宅（现中山西路）创办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教天文，他教地理，蔡锷在此读书。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谭嗣同等集资在小东街创办《湘报》，为湖南最早日报；初为半官方性质，巡抚按月津贴。至八月，全改为商办。他与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蒋德钧、王铭钧、李维格等，人任董事，推举王婆走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骨干；南学会是这年在六堆子的孝廉堂成立的。《湘报》聘请“报友”12人，相当特约记者，其中有易祓、毕永年等。

他并与皇弟邵代藩（老同盟会员，曾任光复宝庆都督）创办新化县速成中学校，即今新化县一中，又创办罗洪三村小学，即今罗洪中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文达招他入都，奏充编书局总撰，